

第一章 近三十年来敦煌所出唐宋书牒研究概述

在中国古代，书牒，又称尺牒，是人们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的工具之一。无论是国家政务的处理，还是私人之间的通讯，都离不开书牒这一信息的载体。“尺牒”一词源自汉代，是对于书写于简牒之上的通讯文字的泛称，它包括官文书与私文书。“尺牒”沿袭到唐宋时期，泛指公文和私人书牒。

敦煌文献中非佛经类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典籍类，二是实用类文献。实用类文献之中包含许多书牒，分散在书仪类、官文书和私文书札中。因此，本文将对自1979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第一节 对敦煌书仪文献的研究

一、中国学者对敦煌书仪文献的研究

敦煌书仪是唐五代宋人书牒的应用文范本。“书”，是指书牒或尺牒，“仪”指礼仪规范。因此，敦煌遗书中有大量的书牒类文献被归入到“书仪”类文献里，从某种角度上说，对书仪类文献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书牒文献的研究。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中的书仪类文献首先进行分类、校录与整理，有的还进行了专题式的深入研究，产生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初，周一良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开始进行敦煌文献中书仪类文献的研究，是“海内外系统研究敦煌写本书仪的第一人”^①。“他以卓越的识见，看到书仪是敦煌卷子中自来整理较少的一组文献，因而勇敢地向这个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开拓。”^②周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③，“对于书仪的源流、唐代书仪的分类、敦煌写本书仪的类型、书仪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书仪对日本的影响等，都做了系统的论述，可以说是填补了敦煌学

① 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的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② 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第7期。《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书仪源流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以上5篇论文又收入在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的一项空白”^①。

在周先生的开拓之下，赵和平、吴丽娱继后进行研究，分别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赵和平从1984年起在周一良的指导下进行敦煌本书仪的整理与研究，十几年来，将一百多件敦煌本书仪整理成《敦煌写本书仪研究》^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③及个案性研究专著《敦煌本〈甘棠集〉整理研究》^④及数十篇论文^⑤。赵和平对敦煌书仪的研究可分成三个阶段：1994年之前，赵和平发表的论文以对书仪的基础性研究为主，至1993年出版《敦煌写本书仪研究》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的《敦煌写本书仪略论》一文，赵和平对于书仪的基本问题做了阐述，如书仪的分类、书仪中的社会文化生活史料价值、书仪的作用、书仪反映的中原文化及书仪向周边民族的传播等，成为作者研究书仪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后来的研究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从1994年后，赵和平发表《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略论》一文后，开始对敦煌书仪中一类实际使用过的书牒考订其历史事实，进行个案性的考证研究^⑥，至1998年出版《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是第二阶段。1998年以后是第三阶段，赵和平发表《〈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⑦，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公布的敦煌文献中的书仪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敦煌本书仪的定义、范围做了新的界定，尤其是指出“表状笺启类书仪”是广义书仪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它的特征是：主要是唐宋官僚社会中曾经使用过的往来书牒。1998年之后，赵和平主要以“表状笺启书仪”中的敦煌本《甘棠集》进行个案性研究^⑧。“作者以数年之功，字斟句酌，终于

① 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②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

③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④ 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整理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

⑤ 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看到的部分唐代社会文化生活》，1990年敦煌研究院“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敦煌写本书仪略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武则天的一种敦煌写本书仪——P.3900号写卷的初步研究》，《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P.4050与S.5613敦煌写本综合研究》，《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晚唐五代时的三种吉凶书仪写卷研究》，《文献》，1993年第1期。《敦煌写本P.2481号性质初探》，《文献》，1994年第4期。《〈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1994年敦煌研究院“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略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岛学刊》敦煌学专号（三），1995年。《后唐时代刺史专用书仪——P.3440+P.3864的初步研究》。以上13篇论文被收入在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⑥ 赵和平：《〈记室备要〉的初步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晚唐五代灵武节度使与沙州归义军关系试论》，《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乐学书局1997年版。

⑦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版。

⑧ 赵和平：《〈甘棠集〉的性质及传入敦煌的时间再探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

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校本，还在查考大量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在校注中勾稽出了书中各件表、状之撰写年月及收件人的履历或所涉及的事件，为使用该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既为人们读懂这些表、状提供了相关信息，也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新资料。”^①

姜伯勤首开书仪与礼制的讨论。^②但系统地从礼仪发展演变的角度展开对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的是吴丽娱，她拓展了书仪研究的新领域——“开启唐礼研究的新途径”^③。吴丽娱对敦煌书仪的研究开始于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后。1999年，吴丽娱发表《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的庶民影响》^④为其对敦煌书仪与礼仪制度研究的开端。之后陆续发表有《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⑤《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⑥《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⑦《关于S.078V和S.1725V两件敦煌写本书仪的一些看法》^⑧《敦煌P.3637〈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年代质疑》^⑨《再论复书与别纸》^⑩《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¹¹《正礼与时俗——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同期互动》¹²。吴丽娱在对近二十年来敦煌书仪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书仪反映的礼制核心的等级关系从围绕家族血缘为中心到以官场为中心的转变，以及唐五代礼庶民化、实用化和官僚化的倾向为特征的中古社会的礼仪文明做了清晰而全面的研究，结成《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一书。此书是在赵和平对敦煌书仪研究的基础上的又一学术力作，尤其是对表状笺启书仪的研究上有新的成果，如对表状笺启书仪的渊源与公文书的发展关系、表状笺启书仪的分类与特色、书牒制作程序与反映的官场礼仪的变迁、书仪与晚唐五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与观点足以启发后学，如唐代表状笺启书仪对汉晋以来形成的书牒之学（尤其是官文书）的继承关系、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从中央到地方的繁荣发展。吴丽娱又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

-
- ① 郝春文：《敦煌本〈甘棠集〉研究》（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
- ② 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收入在姜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 ③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序言（王永兴序），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 ④ 吴丽娱：《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对庶民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⑤ 吴丽娱：《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⑥ 吴丽娱：《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 ⑦ 吴丽娱：《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文史》第56辑，2001年。
- ⑧ 吴丽娱：《关于S.078V和S.1725V两件敦煌写本书仪的一些看法》，《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⑨ 吴丽娱：《敦煌P.3637〈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年代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期。
- ⑩ 吴丽娱：《再论复书与别纸》，《燕京学报》第13期，2002年。
- 11 吴丽娱：《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 12 吴丽娱：《正礼与时俗——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同期互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

史文化》^①，负责“书仪章”的撰写工作。在《唐礼摭遗》的基础上，“书仪章”中既对《唐礼摭遗》中的内容有提炼，又有所补充。除了书仪与礼制的“宏观”研究之外，吴丽娱也利用敦煌书仪文献进行历史史实考证的“微观”研究，如对《书仪镜》中的“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注意到它是“杜氏《书仪镜》中很特别的一部分内容”，“它所刊载的书信，并不仅仅是一些格式套语，而是涉及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名地名”于是对此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进行了考证^①。从2001年起，吴丽娱以研究表状笺启书仪为主，与合作者杨宝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晚唐五代宋初有关敦煌归义军史实的考证类论文^②。

除了以上周一良、赵和平、吴丽娱对书仪展开的综合性研究之外，在对敦煌书仪的研究之初，更多的学者是对包含有丰富的历史事件与信息的“表状笺启书仪”中的实际使用过的某一件或某几件公私书牒展开了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内的研究，或对其进行录文校释，或对其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考证。对 S.1438V 书仪，姜伯勤^②、史苇湘^③、杨铭^④、陆离^⑤都曾考证过沙州陷蕃时期的相关历史事实。对敦煌文献中为数不多的唐五代“表”文，唐长孺^⑥、许福谦、郝春文^⑦；郭峰^⑧、郑炳林^⑨、冯培红、张军胜^⑩；李正宇¹¹等进行了相关史实与社会历

① 张弓：《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① 吴丽娱：《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对庶民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吴丽娱：《敦煌 P.2539V 书状主人公的再辨证》，《民族史研究》第2辑，2001年；吴丽娱：《再析 P.2945 书仪的年代与曹氏归义军通使中原》，《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吴丽娱、杨宝玉：《P.3197V〈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P.3016V〈△乙致令公状〉考释》，《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杨宝玉、吴丽娱：《P.2992V 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归义军朝贡使杨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年4期。杨宝玉、吴丽娱：《P.2945 书状与曹氏归义军政权首次成功的朝贡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2008年。

②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

③ 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遗书斯1438背〈书仪〉残卷的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总第3期）。

④ 杨铭：《一件有关敦煌陷蕃时间的藏文文书——兼及 S.1438V〈书仪〉》，《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⑤ 陆离：《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

⑥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 许福谦、郝春文：《斯四四七三三号写卷〈大晋皇帝祭文〉、〈大行皇帝谥状〉校注及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⑧ 郭峰：《〈侯昌叶直谏表〉与晚唐懿僖时期之政局》，《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⑨ 郑炳林：《敦煌写本〈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缀合与归义军对凉州的管理》，《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2004年。

⑩ 冯培红、张军胜：《传世本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辨》，《兰州学刊》，2009年第4期。

11 李正宇：《〈沙州僧民上吐蕃赞普奏稿〉（又本）——敦煌遗书中一件为阆朝修和请功的奏表》，《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2008年。

史环境的研究。利用书牒研究敦煌归义军相关历史的论文最多。李正宇^①、赵和平、吴丽娱、郭峰^②、邓文宽^③、孙修身^④、苏哲^⑤、赵贞^⑥利用“状”“牒”类书牒文献对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之间的关系、曹氏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来往均做过考证。李军^⑦运用公私书牒文献研究了晚唐时期中央对凉州的经营与管理。系统地运用书牒材料研究归义军历史的是荣新江，在其《归义军史研究》^⑧一书及《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中对与沙州归义军相关的书牒史料，搜罗无遗，以揭示史实、判定年代。利用书牒研究河西民族史尤其是甘州回鹘史，如唐长孺^⑨、陆庆夫^⑩、邓文宽^⑪等。

中国的文学、语言研究学者也对书仪的文学特征及书牒文体进行了研究。周绍良、颜廷亮编《敦煌文学》^⑫中，对书仪的文学性进行探讨，以表、疏、书、启、状、牒、帖等书牒文体分类对敦煌文学进行解说。张锡厚在1992年对敦煌本《甘棠集》的文体特征、文学艺术性进行了研究。^⑬对敦煌书仪中的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是王启涛^⑭、张小艳^⑮。王启涛对敦煌文献中的法制书仪的语言进行了研究。张小艳的博士论文着重讨论书仪的口头用语及在汉语词汇研究上的价值。陈静^⑯对敦煌表状笈启类书仪文献中一类较特殊的书牒文

- ① 李正宇：《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考释》，《文献》，1988年第3期。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89年第4期；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数据》第1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李正宇《曹仁贵名实论——曹氏归义军创始及附梁始探》，《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年。
- ② 郭峰：《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 ③ 邓文宽：《〈凉州节使押衙刘少晏状〉新探》，《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 ④ 孙修身：《敦煌文书伯3016号背第二件文书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
- ⑤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书状文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⑥ 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6卷，第4辑，2001年；赵贞：《敦煌所出灵州道文书述略——兼谈朔方韩氏对灵州道的经营》，《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
- ⑦ 李军：《敦煌写本〈归义军僧官书仪〉拼接缀合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李军：《晚唐凉州节度使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6期；李军：《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 ⑧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 ⑨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⑩ 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陆庆夫：《金山国与甘州回鹘关系考论》，《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陆庆夫：《唐宋之际的凉州嗚末》，《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陆庆夫：《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 ⑪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 ⑫ 周绍良、颜廷亮：《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⑬ 张锡厚：《敦煌本〈甘棠集〉及刘邕生年新证》，《敦煌本唐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 ⑭ 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巴蜀书社2003年版。
- ⑮ 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张小艳：《敦煌写本书仪的文体特色及其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上的价值》，《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
- ⑯ 陈静：《别纸考释》，《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

体——“别纸”进行了文体研究，从“别纸”的源流演变上考察了别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认为“别纸”在唐五代时期是人们书信来往时的复书中对第二纸书信的称谓。杜琪^①也主要是从书仪分类及书仪的文体上立论。近年来，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②将敦煌书仪与日本《万叶集》书牒集进行了比较研究。

台湾学者高明士、王三庆、谢海平、甘怀真、黄亮文都对敦煌书仪进行过研究。黄亮文还有学位论文《敦煌写本张敖书仪研究》，同时发表一些论文探讨敦煌书仪中的版本系统关系^③，是台湾学者对敦煌书仪研究的新的动向。

二、海外学者对敦煌书仪文献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敦煌书仪的研究^④，起始于内藤湖南。1928年，内藤发表了关于敦煌书仪研究的一篇论文。之后，那波利贞、川口久雄、山田英雄等开始从事书仪研究。那波利贞注重研究以书仪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所忽略的各种世俗文书”，视其为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真实面貌的珍贵资料。川口久雄所提出的对敦煌书仪的七类分类法，对于书仪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如在七分法中，川口注意到第四类“实际书信文集”与书仪已经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仪），开始尝试敦煌书仪的细分类研究工作。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至今，日本的敦煌书仪研究自有其特点：在日本，敦煌写本书仪研究，以一件写本为中心的个案研究较少，更多的是结合别的专题进行综合研究，书仪并不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日本书仪研究最多的是敦煌遗书与正仓院文书的相互比较研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一面。在芳贺纪雄的研究中，将书牒也归入书仪中，分正仓院所藏的书仪为三类：十二月仪、吉凶书仪、各种场合实用的书仪，第三类如《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即中国的《杜友晋书仪》。池田温等都注意到了敦煌本书仪的价值，从不同角度对敦煌本书仪加以研究。日本学者丸山裕美子更是在日本书仪与敦煌本书仪的对比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研究工作。广濑宪雄的研究视角较宽，从书仪与外交文书的礼仪格式上，进行比较研究收信、发信两国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当时东亚的国际秩序^⑤，他的研究思路，对于敦煌书仪的研究新方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节 对公文书的研究

① 杜琪：《书仪缘起蠹测及敦煌书仪概说》，《社科纵横》，2002年第6期；杜琪：《敦煌应用散文作品题注》，《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王晓平：《敦煌书仪与日本〈万叶集〉书状的比较》，《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

③ 王三庆、黄亮文：《朋友书仪一卷研究》，《敦煌学》第25辑，2004年；黄亮文：《P.3681、P.4002、P.4042、P.4024五件书仪写卷的缀合与探讨》，《敦煌学研究》，2007年第1期。黄亮文：《〈新定书仪镜〉相关问题的探讨——附论其他书仪写卷的缀补》，《敦煌学》第27辑，2008年。

④ 山本孝子：《日本敦煌书仪研究回顾与展望》，《2009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传承与发展——百年敦煌学）论文集》，2009年。

⑤ 广濑宪雄：《古代东亚地域的外交秩序与书状》，《历史评论》，2007年。

利用敦煌书牒文献中的公文书去研究唐代制度史，日本学者走在前列，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以日本学者中村裕一的论著最具代表性。中村先后出版了唐代文书制度研究的三本著作：《唐代制敕研究》^①《唐代官文书研究》^②《唐代公文书研究》^③，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文书的具体形态及复原上，主要依据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碑刻史料，并用传世文献佐证，复原并考释唐代制敕类文书（《唐代制敕研究》），但也涉及令书、教、露布、告身、牒、状、行状、度牒、公验（《唐代官文书研究》《唐代公文书研究》）。中国学者以吴宗国、祝总斌、刘后滨^④、李锦绣^⑤、李全德、邓小南、冯培红为代表，主要是利用唐代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官文书，主要是中央的制、敕牒类公文书，将研究视野聚焦于从秦汉到唐宋时期中央行政体系的政务运行方式上，去探讨唐宋职官制度实际的运行情况。

敦煌书牒文献中的公文书按其文体格式可分为牒、帖、公验、榜文等，它们是政务信息的载体。

（1）对牒类公文书的研究主要有：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序的探讨——唐公式文的研究》^⑥，这是20世纪80年代时中国学者最早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官文书之一的“牒”文的行政程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但主要是对唐代前期的牒文及其处理程序作了探讨，对吐蕃、归义军时期的牒式及其处理程序没有涉及；对寺院、民间牒文，限于体例，也不涉及。卢向前、王冀青^⑦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有关驿传的牒文书研究唐代的交通通讯。程喜霖^⑧依据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牒类公文书对唐代的过所、公验类的申请程序、勘验过程进行了研究。

（2）对“状”类公文书的研究主要有：吴丽娱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课题——“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课题中的一部分，于2008年发表《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⑨，开始研究公牒中的“状”与中央行政体系里信息沟通的功能。利用公文书中的进奏院状研究唐代进奏院的职能及唐代信息传播的管道，一度是研究热点。张国刚^⑩、吴震^⑪、郑炳林、徐晓丽^⑫皆有论述。新闻工作者也对敦煌的进奏院状感兴趣，

① 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汲古书院1991年版。

② 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版。

③ 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汲古书院1996年版。

④ 刘后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后滨：《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刘后滨：《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刘后滨：《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札记之一》，《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 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序的探讨——唐公式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⑦ 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⑧ 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⑨ 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2008年第1辑。

⑩ 张国刚：《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学术月刊》，1986年第7期；张国刚：《敦煌唐代进奏院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天津出版社1994年版。

认为进奏院状是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但历史学者们普遍认同进奏院状是公文书而非报纸。但敦煌书牒文献中仅有三件进奏院状，由于资料太少，目前的研究者已将注意力转向考证进奏院在唐代长安城内各坊的位置及进奏院状传递信息的具体功能上。

(3) 日本学者阪尻彰宏对敦煌文献中的“榜”文书作过研究，发表有《敦煌榜文书考》^③，研究敦煌归义军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文书行政。赤木崇敏^④对敦煌书牒文献中的封皮纸进行了复原研究，还以1990年发现的BD11181文书为材料，探讨了与归义军政权征税相关的文书行政，研究其征收的具体过程。

(4) 敦煌公文书中还有一类涉及法律争讼的牒、状等属于民事法律规范方面的文书，由刘俊文^⑤，王震亚、赵苒^⑥，唐耕耦^⑦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尤其是唐耕耦《敦煌法制文书》分十四类辑录了敦煌汉文法律文书和相关文献，内容包括了一部分牒状、军事文书等，尤其是第十四类中收录了表、书、启、牒、状、帖等文书。

第三节 总结与展望

经过三十年的研究，中外学者对敦煌书牒文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经过中国二三代学者的努力，学者们敦煌书仪类文献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推进了，目前转向对“表状笺启类书仪”的深入研究。“表状笺启类书仪”最初是周一良为书仪分类时，从书仪的广义概念（书牒的范文）出发，将之归入书仪的，但周一良也注意到其特殊性，即“某些写本看似书仪范文，而实际却很可能是正式表启发出后留以存档的副本”^⑧。赵和平也认为“表状笺启书仪”是敦煌书仪文献中一类特殊的范文，其书题并不称书仪，但根据其内容性质为应酬官场中的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的书、启、状，或是友朋往来的书牒书札，故将它们视为广义的书仪中的一类，即人们撰写书札时模仿和套用的范本。以赵和平的观点，将实际社会生活中使用过的书牒分在“表状笺启书仪”这一类中，是广义的“书仪”概念。但这一宽泛的概念不能完全地体现“表状笺启书仪”的突出的特征，即其中的一部分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过的书牒，其文本形态多样，是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因此，王三庆、黄亮文、吴丽娱等都对“表状笺启类书仪”的定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王三庆认为，表状笺启类书仪，为公文书启及官方往

① 吴震：《P.3547〈沙州归义军上都进奏院上本使状〉试析——试论张淮深何以屡请赐旌节而不获》，《1990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郑炳林、徐晓丽：《读〈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

③ 阪尻彰宏：《敦煌榜文书考》，《东方学》，第102辑，2001年。

④ 赤木崇敏：《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敦煌文献P.2555piece1の检讨を通じて》，《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003年第20期。赤木崇敏：《归义军时代敦煌绿洲地区的税草征发与文书行政》，《待兼山论丛》史学类，2007年。

⑤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⑥ 王震亚、赵苒：《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 唐耕耦：《敦煌法制文书》，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⑧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来的信函，非属私人应用参考的书仪类，不是狭义的书仪定义^①。黄亮文认为，赵和平最初对书仪的概念不够明确，如“作者所论书仪概念虽包括原题书仪的作品，却也同时涵盖了不题名书仪的表状笺启文范。”吴丽娱的认识是，“表状笺启类书仪”可以分为纯粹的公牒和官员间体现私人关系的书信，其性质是公私兼而有之，公私不分^②。由于“表状笺启书仪”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使用或实寄过的书牒文集，其特点是有明确的致书对象；另一种则是为一定场合、对象专门设计的公式文牒，无具体人名、事件。因此，随着对“表状笺启书仪”认识的深入，对敦煌书牒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挖掘其保存当时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价值。

就敦煌书牒文献中的公私文书而言，在公文运作与政务运行等概念和研究视角下，从文书行政方面来探讨制度运行成为近年来唐宋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新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重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出土文献中保留的公文书与传世史料的结合，考察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探讨日常政治生活，并关注制度的演进变化。但目前为止，研究敦煌书牒中的私人书牒一类非常薄弱，历来的研究往往是重官牒而轻私书。众所周知，私人书信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是研究区域社会史的极好材料。“以往研究唐代社会缺少对社会下层的考察，对人数众多、文化层次低、社会地位低的平民百姓着眼甚少……对社会下层的俗文化的研究非常欠缺。”^③近三十年来的研究中十分重视书仪、表状笺启书仪和公牒（官文书），但对私人信件重视不足，如私人书信中的“委曲”一类、“咨”类的私人书牒、帖类等，基层民众给节度使长官的牒、状类等亦公亦私性质的书牒等，目前研究者尚未充分认识其价值，即对于认识唐宋时代基层区域内人们以书牒作为社会交往、信息的传递、政务的处理均有价值，而且其中的书牒文献并不仅限于敦煌一地，其保存中原内地甚至中央的书牒，对于研究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地方区域内的文化教育水平，还有唐宋写本时代的书牒对汉晋简牒时代的书牒制度的继承，都是丰富的材料，具有文化史的意义。

敦煌书牒文献中，除汉文书牒文献之外，还有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书牒文献。一些学者如张广达已经注意到汉、藏、回鹘文的信札在文体格式和问候语上有很多类似之处，可能是河西多民族势力并存下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的一例^④。与之类似，在展望今后的课题

① 王三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诸文要集〉一卷研究》，《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敦煌学》，1991年。

② 吴丽娱：《敦煌的礼书》，《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③ 胡戟：《二十世纪唐研究》，张广达《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研究时，日本学者山本孝子已经注意到汉语书仪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在书信的格式、表达方式上有相互影响、并行的现象，认为通过比较分析，会得到真正显示多语言社会的真实面貌，提出了中日学者合作推动研究的愿望^①。因此，将敦煌汉文书牘与周边各民族的民族语言书牘进行比较研究，将是今后对敦煌书牘文献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新方向。

^① 山本孝子：《日本敦煌书仪研究回顾与展望》，《2009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传承与发展——百年敦煌学）论文集》（兰州），2009年。